

百团大战始末

BAI TUAN DA ZHAN SHI MO

王政柱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百团大战始末

王政柱

广东人民出版社

百团大战始末

王政柱著

*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 销

肇庆新华印刷厂印 刷

254×1168毫米32开本 9.25印张 3 插页 214,000字

1989年10月第1版 1989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50册

ISBN 7—218—00301—x/K·64

*

定价3.35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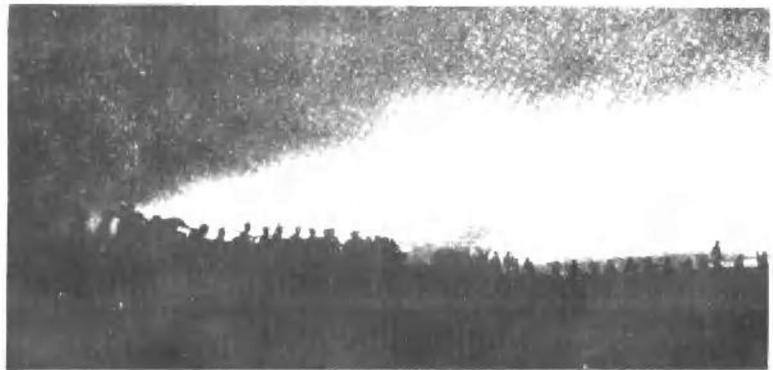
一九三九年四月朱德、彭德怀在山西武乡敌后前
线合影。



一九四〇年春，朱德、彭德怀与聂荣臻、吕正操、罗瑞卿在晋
东南八路军总部驻地王家峪合影。



一九四〇年春，朱德、聂荣臻、刘伯承、邓小平等在晋东南八路军总部驻地。



“百团大战”中，八路军利用拂晓向日军交通线出击。



“百团大战”第一阶段中，八路军向正太铁路发动大破击。



“百团大战”第二阶段中，第一二九师攻克榆社县城。图为第三八六旅旅长陈赓（带相机者）、参谋长周希汉（着大衣者）登上城垣检查战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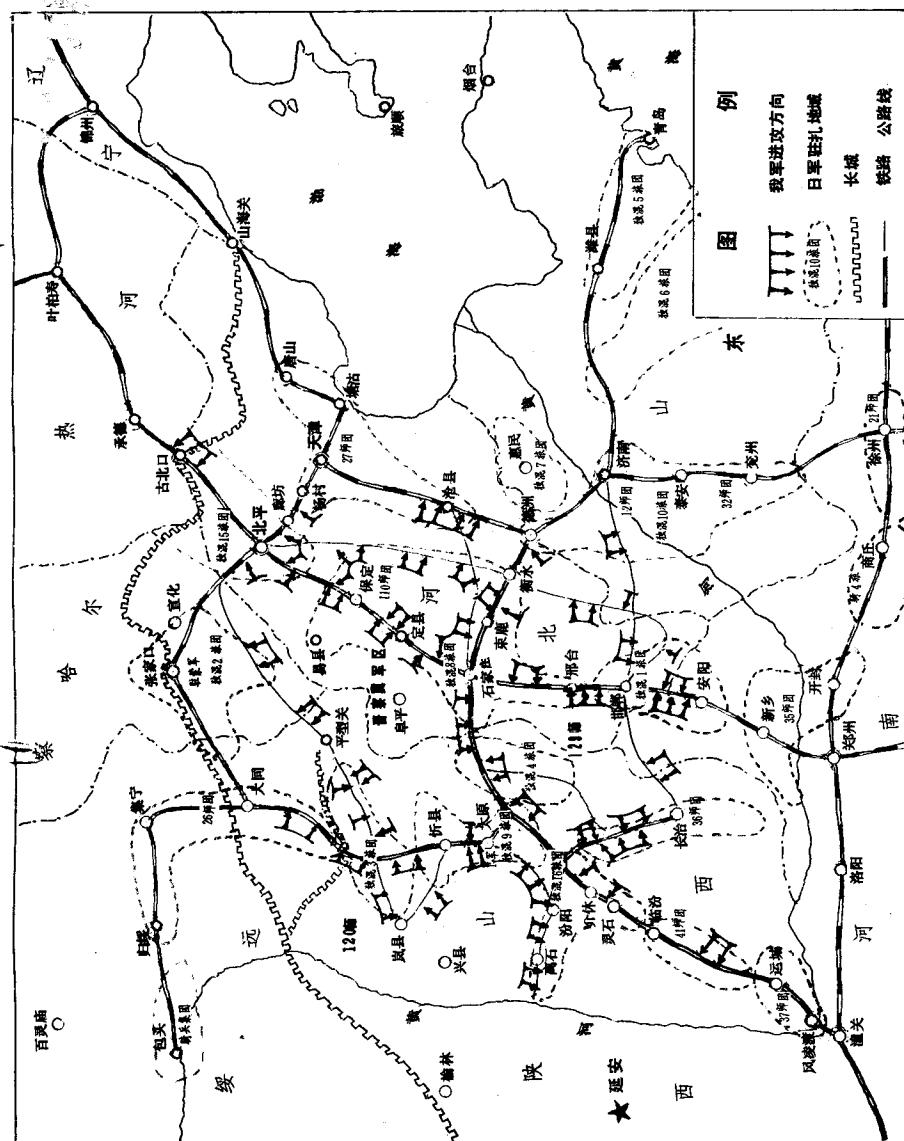


晋察冀军区部队在“百团大战”第二阶段沫灵战役中，向日军发起攻击。



华北民众热烈欢迎参加“百团大战”凯旋归来的英雄们。

百 团 大 战 纵 图 (1940年8月20日至10月上旬)



目 录

一 百团大战前的国内外形势	(1)
(一) 日本加紧对蒋介石集团诱降	(1)
(二) 日军进一步以军事压蒋屈服	(17)
(三) 华北抗日根据地处境艰险	(28)
二 百团大战的酝酿和准备	(39)
(一) 决策的酝酿和形成	(40)
(二) 战役部署	(53)
(三) 八路军积极投入战役准备	(62)
三 百团大战战斗经过	(69)
(一) 百团出击和百团大战定名	(69)
(二) 第一阶段——以摧毁正太铁路 为重点的交通破击战	(74)
(三) 第二阶段——向交通干线两侧 扩张战果	(124)
四 百团大战胜利结束及其以后的 反“扫荡”作战	(159)
(一) 百团大战胜利结束	(159)

(二) 百团大战后的反“扫荡”作战	(165)
五 百团大战的辉煌胜利	(168)
(一) 赫赫战果	(168)
(二) 民众伟力	(170)
(三) 巨大影响	(176)

附录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抗战三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	
(1940年7月7日)	(194)
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政策的决定	
(1940年7月7日)	(199)
中央关于时局趋向的指示	
(1940年9月10日)	(207)
中央关于“击敌和友”的军事行动总方针的指示	
(1940年9月10日)	(213)
扩张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	
——《新中华报》代论	朱德 (214)
百团大战的伟大意义	
——彭德怀1940年8月31日对《新华日报》 (华北版)记者的谈话	(218)
关于百团大战	
——1940年9月25日在北方局高干会上 报告提纲之一部	彭德怀 (224)
巩固与扩大百团大战的胜利	
杨尚昆	(230)

论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	左 权	(233)
刘伯承同志关于百团大战的谈话		(239)
聂荣臻同志关于百团大战对晋察冀社记者的谈话		(248)
百团大战的一个侧面——晋西北	贺 龙	(252)
八路军在华北反“扫荡”的百团大战		
——《新中华报》社论 (1940年8月30日)		(255)
庆祝百团大战在正太路上序战大捷		
——《新华日报》(华北版)社论(1940年8月25日)		
		(258)
庆祝百团大战第二阶段序战胜利		
——《新华日报》(华北版)社论(1940年9月29日)		
		(261)
论百团大战的伟大意义		
——《新华日报》(华北版)社论(1940年12月15日)		
		(264)
百团大战时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参战部队		
战斗序列		(270)
百团大战时日军参战部队战斗序列		(285)
后记		(288)

一 百团大战前的国内外形势

1940年7月7日，中共中央为纪念抗战三周年发表对时局宣言，向全国军民及各党派人士指出：“现在是中国空前投降危险与空前抗战困难的时期，我们不应当隐蔽这种危险与困难”，中国共产党认为自己的责任是向全国提醒这种危险与困难，并指出：“全国应该加紧团结起来，克服这种危险与困难。”^①研究在此后一个多月八路军于华北敌后发动的百团大战，必须首先搞清楚当时中国所处的这种“空前投降危险与空前抗战困难”的极端严重的形势。可以说，取得规模空前胜利的百团大战，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不愿做亡国奴的华北人民，为了克服这种“空前投降危险与空前抗战困难”的局势而发动的，它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和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史上，写下了极其光辉的一页。

（一）日本加紧对蒋介石集团诱降

灭亡中国，建立所谓“东亚新秩序”，是1936年日本内阁

^①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114—1115页。

“五相”会议确定的“根本国策”。但是，它的财力、兵力，它同英、美、法、荷等帝国主义国家在东方利益上的矛盾，特别是担心同中国北面的苏联同时发生战争，使得它最害怕把侵华战争拖延下去。日本打的是速战速决的如意算盘，在芦沟桥事变以后，计划以11个师团在三到六个月内解决中日战争，攫取中国，然后或北攻苏联，或南下夺取南洋地区。然而，中华民族不可侮！战争打了一年多，中国人民非但没有被征服，相反地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在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上，给予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随着战局的扩大和战线的延长，到1938年末，日军在中国战场上的兵力增加了一倍多，达到24个师团，仍然不敷应用；而此时却已再也无兵可增，它的另外九个师团部署在朝鲜和中国的东北，日本国内只剩下两个师团。兵力的严重不足，财力、物力的巨大消耗，“速战速决”战略计划的破产，统治集团内部在外交政策上的分歧，国内人民反战情绪的滋长，特别是中国人民毫不妥协的坚决抗战，使日本侵略者在1938年10月占领武汉、广州之后，不得不基本上停止对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改变其侵华的方针和策略。中国抗战进入相持阶段。

日本侵华方针、策略改变的核心，就是对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由原来的军事打击为主，转到了以政治诱降为主，企图通过政治谋略手段，诱使国民政府投降，以实现其“解决中国事变”的战略目标。

1938年11月3日，是日本的“天长节”，即明治纪念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选择这一天发表重要声明（第二次近卫声明），明显改变他同年初在“第一次近卫声明”中宣称的“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企图以武力推翻蒋介石政权，而另行扶植伪政权来“调整两国邦交”的立场，提出帝国之目的在于

“共同防共”，“建设确保东亚永久和平的新秩序”；“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予以拒绝。”① 50天后，即1938年12月22日，近卫又发表第三次声明，进一步向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国民政府招降。声明高唱日本对中国“出动大军的真意”，“既不是区区领土，也不是赔偿军费”；只要中国政府屈服，“放弃抗日的愚蠢举动和对满洲国的成见”，就能使“日满华三国”“以建设东亚新秩序为共同目标而联合起来，共谋实现相互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② 这就是日本招降的所谓“近卫对华三原则”。

日本政府接连发表招降声明，使当时还隐藏在抗日阵营内部的反共投降派大为活跃。早就与日本暗中进行“和平密谋”的国民党中央副总裁、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国防会议副主席汪精卫，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国民政府副秘书长周佛海等，在读了第二次近卫声明之后，立即派从1937年8月9日起一直同日方进行秘密接触的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和梅思平等到上海，同日本陆军省参谋本部军务课课长影佐祯昭、中国课课长今井武夫会谈，于1938年11月20日达成了投降卖国的《日华协议纪录》，拟定了汪精卫响应日本招降声明和逃往河内相机成立新政权的行动计划。12月5日和18日，周佛海、汪精卫先后飞离重庆到昆明，19日，汪精卫夫妇和周佛海、陶希圣、曾钟鸣等逃往河

① 《政府声明——虽国民政府，亦不拒绝》，载《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70——277页。

② 《第三次近卫声明》，《中国现代史资料选编》〔四〕，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第598页。

内。29日，汪精卫在河内发表“艳电”，公然美化第三次近卫声明提出的对华三原则，要求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以此为基础，“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①。

汪精卫集团公开叛国投敌，曾使日本政府中的军国主义分子喜出望外。但他们很快发现，这一小撮中华民族的败类，不仅受到亿万中国人民的同声唾骂，而且手中没有一点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对其实现“解决中国事变”的战略目标起不了多大作用。“要解决陷入泥潭的事变”，“非得和重庆直接谈判不可”^②。于是，日本当局在不冷不热地扶植汪精卫建立伪政府的同时，便把注意力移向已经向它多次“暗送秋波”的“更为迷人的伴侣”——重庆国民政府蒋介石集团^③。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早在抗日战争爆发初期，就曾有过与日本妥协的幻想。芦沟桥事变三个月后，正当上海军民与日军浴血奋战之际，国民政府就企图通过德国来“调解”中日关系。1937年11月初，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向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和外交部部长王宠惠，转达了日本政府提出的包括成立“内蒙自治政府”、放弃抗日政策和共同防共等为内容的中日和谈条件。12月2日，蒋介石接见陶德曼，表示“中国将接受日本条件，作为和谈的一个基础”。蒋介石还说：“中国将以协商的精

①《汪精卫投敌“艳电”》，《中国现代史资料选编》〔四〕第600页。

②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3卷第1分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

③〔美〕约翰·亨特·博伊尔：《中日战争时期的通敌内幕》〔下〕，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396页。

神讨论日本的要求，准备取得谅解，期待日本也取同样态度。”^① 12月6日，汪精卫以国防会议副主席的身分在汉口召开最高国防会议第54次常委会，听取了外交次长徐谟关于陶德曼调停经过的报告后，决定接受陶德曼调停，实现“中日和平”^②。但是，在这七天之后的12月13日，中国的首都南京陷落。日本的态度马上又变得强硬起来，不仅追加了苛刻的谈判条件，而且要中国政府以战败国的姿态表明乞和的态度。蒋介石无法接受，日本政府便于1938年1月16日发表了“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

德国的“调解”失败以后，国民政府仍然通过多种渠道，向日本侵略者“暗送秋波”。蒋介石通过周佛海、高宗武等亲日派分子，很快与日本取得了联系。1938年3月，在蒋介石的同意下，高宗武窜到日本、香港和上海等地，探询日本的“和平”意图；蒋介石又让高宗武向日方表明：“我们决不是绝对反对和平”^③。只要先行停战，就可以进行谈判。由于当时日本侵略者气焰正盛，积极准备“进行徐州作战以及对武汉之敌施以威压”，妄图使华北、华中连接起来，以武力灭亡中国，因而坚持“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对蒋介石的要求置之不理。

在日本侵略者疯狂扩大侵华战争的同时，发誓要“用一切手段使德国人占领全世界”的希特勒，也拼命在欧洲扩张“生存空间”。在德、意武装干涉西班牙之后，德国就制定了新的战略目标：“同时推翻捷克斯洛伐克和奥地利，以便在可能对西方的作

①井本雄男：《作战日志中的中国事变》，转引自何理《抗日战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1页。

②参见《中国现代史资料选编》〔四〕第601—604页。

③《今井武夫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第76页。

战中解除我们侧翼的威胁”。按照这个目标，德国在1938年3月吞并了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的奥地利，接着就陈兵捷克边境，向捷政府提出吞并苏台德区的要求。战火已经在英、法两国的前庭后院接连燃烧，但英、法和大洋彼岸的美国，却一直对玩火者采取“绥靖政策”。它们的一贯做法是通过牺牲别国的利益来换取德国的妥协，把法西斯德国这股“祸水”引向东方，去镇压欧洲人民革命和进攻社会主义的苏联。因而，它们先以“中立”、“不干涉”的名义牺牲了西班牙和奥地利，又在处心积虑地拍卖捷克斯洛伐克。9月29日，英、法、德、意四国首脑张伯伦、达拉第、希特勒、墨索里尼在德国慕尼黑的“元首宫”举行会议。会议在听取了希特勒宣布的占领苏台德区是德国对西方“最后的要求”的虚伪保证后，于次日凌晨签订了出卖捷克民族利益的《慕尼黑协定》。然而，希特勒在占领了苏台德区后并没有履行诺言，于1939年3月15日进兵布拉格，吞并了整个捷克斯洛伐克。

为了制止德、意法西斯的侵略，苏联政府再一次倡议与英、法等国采取联合行动，建立反法西斯联盟。英、法政府迫于本国人民和世界舆论的压力，虽然于1939年4月派出谈判代表到达莫斯科，但由于他们一直怀着“祸水东引”的鬼胎不放，丝毫没有同苏联达成协议的诚意，使谈判拖了四个月终归破裂。苏联政府为了延缓苏、德之间的战争，避免遭受德国与日本的东西夹击，在苏、英、法三国谈判破裂之后，同意德国的要求，于1939年8月23日与德国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从而挫败了英、法等国“祸水东引”的阴谋，赢得了反侵略战争的准备时间，并且加深了德、日两个法西斯国家之间的矛盾。日本当时正积极与德、意拉拢，一心想借德国在西方牵制苏联，以便其增调兵力加强在诺门坎（哈勒欣河）地区继续向苏蒙联军的进攻。《苏德互不侵